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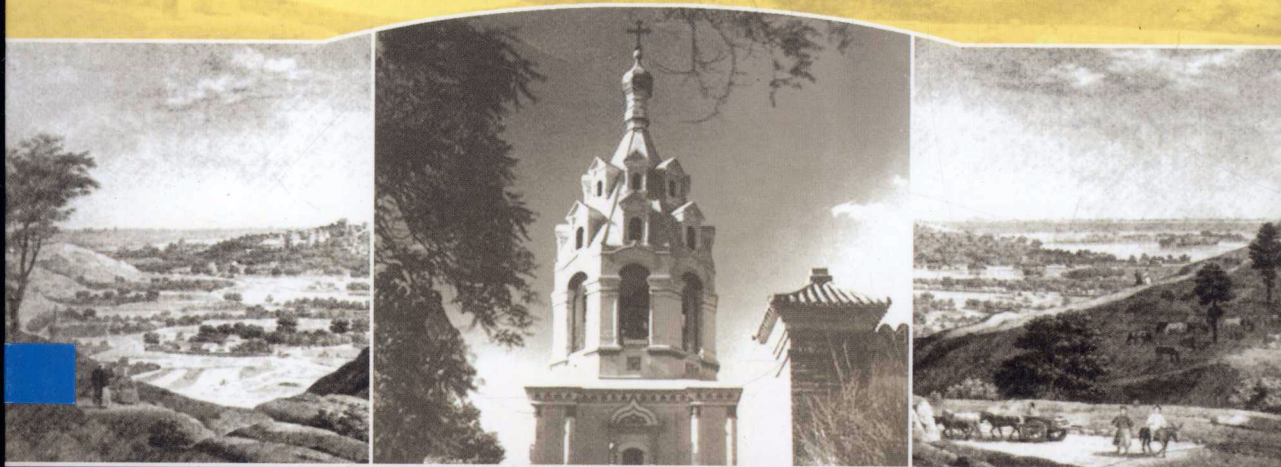
中西文化交流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K249.03
6

俄国传教团 与清代中俄文化交流

THE RUSSIAN ORTHODOX
MISSION IN BEIJING
& SINO-RUSSIAN CULTURAL
EXCHANGE IN QING DYNASTY

肖玉秋 /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中西文化交流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俄国传教团

与清代中俄文化交流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肖玉秋/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国传教团与清代中俄文化交流 / 肖玉秋著.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 - 7 - 201 - 06159 - 7

I. 俄… II. 肖… III. 传教士—作用—文化交流—中国、
俄罗斯—清代 IV. K249.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6880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9.75 印张 2 插页

字数: 440 千字 印数: 1 - 3000

定 价: 42.00 元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中外关系史上的特殊历史现象 19

第一节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之由来 19

- 一、蒙元时期东正教传入中国之可能 19
- 二、哥萨克东侵与东正教入华 21
- 三、雅克萨战俘与东正教传入北京 23
- 四、俄国对俄罗斯佐领宗教活动的关注与经营 25
- 五、第一届传教团来京 28

第二节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之特殊性 30

- 一、特殊机构 30
- 二、特殊职能 34

第二章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之宗教活动 37

第一节 从第一届传教团到《中俄天津条约》 37

- 一、列扎伊斯基传教团或第一届传教团 38
- 二、主教区计划流产以及俄国传教团法律地位的确立 43
- 三、从《恰克图条约》到《中俄天津条约》 45

第二节 从《中俄天津条约》到义和团运动 65

第三节 中国主教区成立以后 74

- 一、重整传教团 75
- 二、东正教势力在中国的扩张 77

第四节 传教活动分析 88

第三章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之研究活动 94

第一节 哲学与宗教 94

- 一、儒学 94
- 二、道教 102
- 三、佛教 104
- 四、其他宗教 106
- 第二节 历史与地理 108
 - 一、历史 108
 - 二、地理 113
- 第三节 语言与文学 115
 - 一、语言 115
 - 二、文学 122
- 第四节 社会与法律 125

第四章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之教育活动 129

- 第一节 揭开近代欧洲国家留学中国序幕的俄国留学生 129
 - 一、选派与构成 130
 - 二、学习与管理 132
 - 三、去向与作用 137
- 第二节 俄国本土之汉满蒙语教学 140
 - 一、科学院和外务院的满汉语学校 140
 - 二、为中俄贸易服务的恰克图汉语学校 143
 - 三、俄国最早设立汉满蒙语专业的高等学府喀山大学 147
 - 四、俄国汉学重镇圣彼得堡大学 150
- 第三节 俄罗斯文馆的俄人教习与俄文教材 152
 - 一、身为俄国商人、降人及后裔的俄人教习 153
 - 二、身为传教团教士和学生的俄人教习 156
 - 三、身为传教团领班的俄人教习 159
 - 四、中国第一部俄语教科书 165
- 第四节 在华开办学校 169

第五章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与中俄在其他领域的文化交流 174

- 第一节 图书交流 174
 - 一、中国典籍收藏 174

二、传教团图书馆 181

三、中俄政府互赠图书 186

四、在华刊印图书 196

第二节 医学交流 215

一、俄国“长桑”沃伊采霍夫斯基 218

二、“惠济遐方”的基里洛夫 220

三、亦医亦官的塔塔里诺夫 222

四、《本草纲目》译者巴济列夫斯基 223

五、探索中医奥秘的科尔尼耶夫斯基 224

第三节 美术交流 225

一、关注中国颜料的休金和比丘林 226

二、第一个收藏中国绘画作品的列昂季耶夫斯基 227

三、北京城里第一位俄国职业画家列加舍夫 229

四、描绘万寿山风景的科尔萨林 233

五、再现京城市井生活的奇穆托夫 234

六、刻画乞丐流民的伊戈列夫 236

第四节 在华修建的主要教堂 239

一、北馆中的教堂 240

二、南馆中的教堂 243

结 语 246

一、传教团文化活动的特点 246

二、特洛伊木马与文化使者 263

附 录 269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成员列表(1715—1902) 269

参考文献 284

后 记 310

引言

自蒙古西征基辅罗斯之后,中国与俄国再次发生联系,大致是在明末清初,迄今已有近四百年的历史,到1917年也已有约三百年的历史。17世纪中叶,俄国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经过两次雅克萨战役,在清朝军队的打击下,俄国的侵略势头受到遏制。1689年中俄两国在平等谈判的基础上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规定外兴安岭以南、额尔古纳河以东的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归属中国。此后直到19世纪中叶两国间没有发生重大武装冲突,保持了和平而正常的交往态势。19世纪中叶,俄国利用英法发动鸦片战争之机,趁火打劫,撕毁《尼布楚条约》,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天津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864年,俄国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强占了中国西北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由此,中国和俄国的关系演变成被侵略者与侵略者的关系。综观《尼布楚条约》签订后至十月革命前的中俄关系史,既有沙俄侵华和中国人民的抗俄斗争,也有约一个半世纪的和平交往。无论是沙俄侵华时期,还是和平交往时期,两国在政治、外交、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发生过各种各样的联系。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中俄关系史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是沙俄侵华和领土疆界问题。随着全球形势的变化,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空前活跃,文化关系史已经成为中俄关系研究领域新的热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拓展中俄关系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全面开展中俄文化关系史研究是时代赋予史学工作者的责任。

在中俄两国文化关系史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我国史籍亦称俄罗斯馆)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确切地说,要研究中俄两国的早期文化关系史,很难离开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问题。自1715年开始的二百多年里,俄国向中国一共派遣了二十届东正教传教团。由于东正教的特殊性以及俄国对华政策的需要,这个传教团实际上是一个兼有外交、商务和文化等多重职能的机构。尤其是19世纪60年代以前的中俄关系,无论外交、贸易,还是文化,几乎事事通过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传教团一身而兼三任,而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一直是传教团的重要使命。即使在1861年之后,传教团的主要职能仅限于传教布道,履行的同样是文化职能。如今,当我们从文

化交流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传教团时,发现了许多新的史料,获得了许多新的印象,切实感受到了对这一特殊宗教团体进行研究的必要性。中俄间举凡宗教、哲学、语言、文学、史地、教育、图书、医学和美术等领域的文化交流无一不是以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为主要媒介。当然,传教团的文化活动首先是为俄国政府利益服务的,然而也不能否认,正是由于有了传教团,才使得 18 至 19 世纪中俄文化交流展现出比较丰富的图景。

因此,研究传教团与中俄文化交流之间的关系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通过系统梳理与分析传教团在中俄文化交流领域的所作所为,有助于更加全面而清晰地认识其性质、功能以及在中俄关系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为我国中俄关系史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进行新的探索和尝试。

我国对中俄关系的研究是随着中俄关系的发展而逐步开展起来的。有清一代,一些学者致力于中俄关系研究,重点为边疆防务与中俄边界问题,如吴振臣的《宁古塔纪略》、方式济的《龙沙纪略》、杨宾的《柳边纪略》、松筠的《绥服纪略》、俞正燮的《癸巳类稿》、魏源的《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曹廷杰的《东北边防辑要》和《西伯利东偏纪要》等。^① 而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则对两国文化交流给予了关注。这部著作成书于 1858 年,集康熙以来中俄关系研究之大成,利用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一切有关中俄关系的资料和著述。其中“俄罗斯馆考叙”、“俄罗斯学考叙”、“俄罗斯进呈书籍记叙”和“考订俄罗斯佐领考叙”等卷涉及俄国传教团。尽管记载简略,有些事仅寥寥数语,但作为为数不多的年代最早的中国文献,自有其突出的价值。

民国时期,中俄关系的研究重点仍然围绕着中俄边界、中俄交涉和俄国侵华几个方面。如蒋廷黻的《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系统地论述了俄国向东扩张,占领黑龙江流域,逼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割地条约的历史。即使是被后人推崇为民国时期中国研究清代中俄关系史权威的陈复光的《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也未能在内容上超越他的同时代人。这部著作实现了作者本人追求的目标:“盖撰史首在搜罗广博,取材精当,而撰外交史,尤须采集有关各国对外国策之资料,庶纪事立论,较近客观。学术研究,宜力求正确也。”^② 正因为如此,该书直到今天仍是中俄关系史研究者必备的参考书。

20 世纪 50 年代是中苏关系史上的蜜月期,受政治气候影响,学术界大力宣扬中苏友谊,回避历史上沙俄的侵华活动。60 年代两国关系恶化,我国学

^① 参见吕一燃:“清代和民国时期的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01 年第 4 期。

^② 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上海书店 1990 年版,“自序”第 2 页。

界开始把重点转向研究中俄关系史。自 70 年代开始,每年都有几十篇甚至上百篇论文和译文发表,先后有多部专著问世,中俄关系史研究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局面。其代表性成果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沙俄侵华史》、戎疆的《沙皇俄国是怎样侵略中国的》、《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编写组的《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编写组的《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傅孙铭的《沙俄侵华史简编》、佟冬的《沙俄与东北》、复旦大学历史系《沙俄侵华史》编写组的《沙俄侵华史》等。

70 年代,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问题已经进入一些学者的视野,方秀的论文《沙俄的侵华工具——俄国东正教布道团》和《太平天国时期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的侵华活动》认为传教团是沙俄侵华的急先锋。进入 80 年代以后,传教团问题继续受到关注。黄心川的《沙俄利用宗教侵华简史》强调了传教团的情报和外交功能。乐峰的论文《东正教在中国传播的几个特点》从五个方面说明,传教团实际上是从事间谍活动,搜集中国各方面情报,为沙俄政府侵华政策服务的工具。高崖的《东正教传入中国及其在北京、天津的发展》以及第一位中国籍东正教主教杜润臣之子、东正教神父杜立昆的《俄国东正教传入天津前后》叙述了东正教在北京和天津的传播经过。张绥的《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关于东正教的第一本专著。作者摒弃了以往简单否定的态度,将东正教在中国的历史划分成几个阶段,分别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何桂春的《中俄不平等条约与沙俄传教士团的侵华活动》、单光鼐的《沙俄传教士团与中俄外交关系》和杨玉林的《俄国传教士团与十八世纪中俄关系》等文章专论传教团与俄国对华外交之间的关系,对传教团的本质进行了透视,是 80 年代该研究领域的上乘之作。另外,由孙越生、姜筱绿主编的《俄苏中国学手册》是一本难得的工具书,对传教团以及成为中国学家的传教团成员加以介绍,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学术指引。

90 年代以后,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深入人心,我国与传教团问题相关的中俄文化关系史研究焕发了生机,相关书籍和文章陆续问世。蔡鸿生的《俄罗斯馆纪事》是一部传教团研究力作,对俄罗斯馆的沿革、俄罗斯馆与汉学、俄罗斯馆与中俄贸易的关系进行了缜密考证,资料丰富,反映了作者深厚的史学研究功底。2006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该书的增订本。李明滨的《中国与俄苏文化交流志》涵盖内容很多,包括了沙皇俄国、苏联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三个时代,其中专辟一节论述东正教传入中国 and 主要活动。此前国内已出版的中外文化交流史著作一般没有或很少涉及中俄文化交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与俄苏文化交流志》具有开拓性。黄定天的著作《中俄经贸与文化交流史研究》探讨了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史,但重点在苏联时期。宿丰林的著作《早期中俄关系史研究》汇集了作者在早期中俄文化交流史方面

的研究成果。乐峰是著名的东正教研究专家,其专著《东正教史》涉及东正教的起源、教义、特点、教堂艺术、在俄罗斯的传播与发展以及全世界的东正教会等方面。作者摆脱了传统的片面评价模式,注重进行客观的介绍,有助于读者在俄国东正教的大背景下了解驻北京传教团。佟洵的论文《试论东正教在北京的传播》称其为不传教的传教团。戴桂菊的论文《关于俄国来华传教士团的历史定位问题》就俄罗斯学者对传教团的评价进行了反思。此外,随着 90 年代以来中国国际汉学研究的兴起,一些从事俄国汉学研究的学者开始对出自传教团的著名汉学家进行研究。90 年代的研究成果显示,我国学者已经开始重视传教团与中俄文化交流的关系,对它的评价也趋于冷静和客观,在承认它搜集中国情报,为俄国政治和外交服务的同时,也不否认其活动在客观上激励了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为沟通中俄文化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由于中国史籍记载很少,传教团的报告、书信、藏书、著作手稿和日记等都收藏在俄罗斯各档案馆中,必须挖掘大量的俄文资料,才能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进一步丰富和深入。

俄国学者自 18 世纪 50 年代以来就以历史档案为基础,对驻北京传教团进行了不间断研究。在长达 250 年的时间里,俄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各具特色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 18 世纪 50 年代到 20 世纪初的“帝俄时期”,或者“作为教会史研究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十月革命到 1991 年苏联解体的“苏联时期”,抑或“作为汉学史研究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联邦时期”,也可称之为“全面研究阶段”。

1. 帝俄时期:作为教会史研究的阶段

在 1715 年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抵京的三十多年后即有俄国人开始对这段历史进行研究。第四届传教团修士司祭斯莫尔热夫斯基(Феодосий Сморжевский)利用往届传教团成员遗留下来的档案资料以及流传下来的趣闻逸事,完成了俄国第一部关于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历史的著作《驻北京传道团之我见》(Замечания о пекинских духовных миссиях)。斯莫尔热夫斯基祖籍波兰,曾随耶稣会士学习科学,来华前是基辅神学院的教授,是这一届传教团成员中知识素养最高的一位。作者采用编年体例,以辛辣的笔调记录了第一届至第四届驻北京传教团中发生的形形色色的事情。斯莫尔热夫斯基在 1751 年 1 月 22 日,即 35 岁生日那天完成了书稿的写作。令人感兴趣的是,作者对驻北京传教团的阴暗面进行了详尽的描绘,对前几届领班及成员的种种劣迹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批判,为认识俄国传教团的早期历史及其在传教布道和满汉语学习方面少有建树的原因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素材。这部手稿自 19 世纪初就引起了后人的注意。第八届传教团领班格里鲍夫斯基(Софроний Грибовский)在撰写传教团史时参考了该手稿。圣彼得堡皇家

科学院历史学家斯帕斯基(Г. И. Спасский)称文中“充满了对其同道的粗野和讽刺的言词”,并认为这是此作长期难以面世的主要原因。^① 第十届传教团监护官、曾任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季姆科夫斯基(Е. Ф. Тимковский)在其所著《1820年和1821年经过蒙古的中国游记》(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Китай через Монголию в 1820 и 1821 гг.)中认为,“斯莫尔热夫斯基神父关于驻北京传教团的纪事在许多方面都是很有趣的”^②。他显然认识到了这部作品的价值,于1821年将其带回了圣彼得堡。^③ 1905年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教授维谢洛夫斯基(Н. И. Веселовский)整理发表了其中的第二节“随修士大司祭列扎伊斯基来的修士司祭拉夫连季神父”和第四节“关于列扎伊斯基率领的传道团中的教堂辅助人员”^④。由于前几届传教团神职人员素质普遍低下,无论是在传教方面,还是在语言学习和学术研究方面都没有取得显著成绩,再加上历史上留下的相关记载微乎其微,我们现在只能从他们写给圣务院的报告中找到一些有关传教团早期活动的支离破碎的信息。因此,斯莫尔热夫斯基有关前四届传教团的记述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并且开创了传教团成员研究传教团历史的传统。此外,斯莫尔热夫斯基撰写的另外一部极具价值的手稿也由季姆科夫斯基于1821年带回俄国,1822年以《论在中国的耶稣会士》(Об иезуитах в Китае)为题发表于《西伯利亚通报》(Сибирский вестник)。^⑤ 这部著作的手稿现收藏在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手稿研究所,名为《斯莫尔热夫斯基中国札记》(Записки о Китае Смогоржевского)。^⑥

第二位对俄国驻北京传教团历史进行全面描述的是第八届领班格里鲍夫斯基。他不仅是第一个研究传教团历史的领班,而且还是“第一个根据长期观察和利用他人资料对清朝政治生活进行文字描述的传教士团领班”^⑦。据

① [俄]维谢洛夫斯基编:《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一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俄语编译组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2页。

② Тимковский Е. Ф.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Китай через Монголию в 1820 и 1821 гг. Ч. 2. СПб., 1824, с. 29.

③ Шубина С. А.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 (XVIII—начало XX в.)// История и культура Востока Азии. Том 1. Новосибирск, 2002.

④ 见[俄]维谢洛夫斯基:《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一册,第102—110页。

⑤ Августин (Никитин).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отношений (Пекинская Духо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XVIII столетии)// Миссионер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01, № 6.

⑥ Киктенко В. А. Источни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 в фондах института рукописей НАН Украины// Украина-Китай: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аналит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01, № 1.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俄苏中国学手册》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页。

阿多拉茨基(П. С. Адоратский)统计,他一共撰写了12种著作,内容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地理、气候、民族和军事等诸多方面,完成了俄国政府为他制定的刺探“那个遥远国家中各民族生活与活动”情报并在“回国后向外务院”汇报的训令。^①在他的作品中有一部没有标题的手稿,详细地叙述了中俄两国的最初交往、雅克萨战俘来京的经过和俄罗斯佐领对东正教信仰的动摇和背弃情况,同时介绍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各届传教团领班的生活和活动,列出了第一届至第八届传教团随行学生的名单。格里鲍夫斯基撰写这部著作时利用了传教团中收藏的档案资料,其中也包括斯莫尔热夫斯基的《驻北京传道团之我见》。与斯莫尔热夫斯基相比,格里鲍夫斯基的作品更加系统,内容更加翔实,虽然也揭露了传教团中的黑暗面,但已经没有斯莫尔热夫斯基作品中明显表露出的对传教团的“憎恨”,他们的叙述方式基本一致。这部手稿数次易主,后来在瓦西里耶夫(В. П. Васильев)院士的遗物中被发现,由维谢洛夫斯基于1905年整理发表,冠名曰《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的历史纪事(关于俄国人何时开始在北京定居及北京之有俄罗斯东正教的情况报导)》(Уведомление о начале бытия россиян в Пейдзине и 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и в оном грекороссийской веры)。^②在维谢洛夫斯基编写的《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中还收录了《瓦·帕·瓦西里耶夫所作的补充记述》,这是瓦西里耶夫从俄国考古学会得到格里鲍夫斯基的手稿后对其进行的补充,主要是关于第十一届至第十三届驻北京传教团的资料。瓦西里耶夫对魏若明(Вениамин Морачевич)、安文公(Д. С. Честной)、佟正笏(П. А. Тугаринов)等人的独到评价对后来的学者影响很大。

维谢洛夫斯基以一位历史学家的敏锐眼光发现了以上三部著作的价值,于1905年以《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为题结集出版,避免了这些重要史料的散失,成为一百年来从事该问题研究的学者的案头必备之书。但维谢洛夫斯基本人并没有对传教团的历史展开研究,他在序言中仅仅介绍了这几部手稿的创作和发现过程。真正将驻北京传教团历史作为学术研究对象而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是第十六届和第十七届传教团修士司祭阿多拉茨基。

阿多拉茨基早年在喀山神学院学习期间即开始研究俄国教会历史,1882年到北京后遂将驻北京传教团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并写出了一系列论文,发表于《东正教话友》(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собеседник)等报刊,最终在1887年于喀山

^① Киктенко В. А. Источни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 в фондах института рукописей НАН Украины.

^② 见[俄]维谢洛夫斯基:《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一册,第15—78页。

推出了两卷本著作《东正教在华两百年史》(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Китае за 200 лет е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Опыт церковно -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ивн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并作为硕士学位论文提交喀山神学院。作者利用了驻北京传教团、俄国公使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俄国外交部、圣务院的档案以及皇家公共图书馆、北京天主教会图书馆、上海的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等地以及天津的俄商斯塔尔采夫(А. Д. Старцев)等人的藏书,将零零散散的有关材料进行仔细甄别和筛选,澄清了许多有关传教团认识的盲点。此外,阿多拉茨基参考了斯莫尔热夫斯基有关前四届传教团的记载,大量引用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Николай Бантыш - Каменский)所著的《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дел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и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с 1619 по 1792 г.)中收录的档案材料。作者将自己比喻成一位“粘贴画家”,“挑选适合的色彩,用小的部件组成一个完整的作品,以此展现作品的主旨思想”^①。阿多拉茨基从1685年雅克萨战役中归顺的俄国战俘说起,一直写到1808年第八届传教团期满回国,内容包括各届传教团的组建、派出、成员介绍、来华旅途、换班过程、教堂、各成员间的关系、雅克萨战俘后裔的东正教信仰以及两国关系变化对传教团命运的影响等。作者还同步介绍了北京耶稣会士的活动情况及其与俄国和传教团的微妙关系。阿多拉茨基在书中提出了许多自己的观点,如将1685年雅克萨战俘来京作为东正教入华的起点,提出了第一个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历史分期方案,即将1745年作为两个时期的分水岭,认为传教团在1685年至1745年间主要任务是为雅克萨战俘主持圣事和培养俄国来华留学生,中国政府赋予了传教团成员优越的地位并给予特别的庇护,而自第四届传教团开始增加了外交和研究中国的职能,但由于受中俄关系发展大环境的制约,加上某些传教团成员素养不高和物质供给不足,传教团的活动时常举步维艰。阿多拉茨基顺利通过了答辩,其论文被评阅人、专门从事教会历史研究的喀山神学院教授兹纳缅斯基(П. В. Знаменский)称为“第一部全面而完整地论述北京传教团的著作”^②。当然,兹纳缅斯基也指出了阿多拉茨基的分期方案证据不足,缺乏说服力,且述多论少,对一些重大问题未表明自己的看法,批评他行文过于谨慎,怯于作出结论。由于该作引用的一些传教团档案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被焚毁,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显得弥足珍贵。所以,1997年由俄罗斯

① Шубина С. А.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 (XVIII—начало XX в.).

② Хохлов А. Н. Николай Адоратский (1849—1896)—Историограф Пекин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XXXII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Китае>. М., 2002.

科学院院士齐赫文斯基(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等人主编的《俄国传教团在中国的历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一书重新收录了这部作品的第一卷,即1685年至1745年传教团的历史。另外,阿多拉茨基没有满足对前八届传教团的研究,在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以前就写出了俄国历史上最为翔实的关于第九届传教团领班比丘林(Н. Я. Бичурин)的长篇专论《亚金甫神父(历史专论)》(Отец Иакинф.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этюд.),连载于1886年的《东正教话友》。^①而后,他在写给俄国驻北京总领事柏百福(П. С. Попов)的信中称他将“继续撰写从1828年至1878年的传教团历史”^②。但是,由于健康问题以及担任主教以后教务繁忙,未能完成写作计划,他的心愿直到30年后才由后人实现。这个人就是第十八届传教团领班英诺肯提乙(Иннокентий Фигуровский)。

英诺肯提乙是第十八届传教团的修士大司祭,从1897年到1931年,长期在中国主持教务。为纪念俄国传教团来华二百周年,英诺肯提乙组织编写了《俄国东正教驻华传教团简史》(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 составленная по случаю исполнившегося в 1913 году 200-летнего юбилея е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于1916年在北京出版。该书在写作体例上与阿多拉茨基基本相同,按照时间顺序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历届传教团在北京的主要活动,一直写到他所领导的第十八届传教团,同时简要介绍了每个传教团成员的生平和活动,对其汉学成就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关于前八届传教团的论述主要取材于阿多拉茨基等学者的著作,而在“自1806年到1900年这段历史的写作过程中主要使用了未曾公布过的俄国圣务院和外交部亚洲司的档案材料”^③。义和团以后的历史为英诺肯提乙所亲历,其材料来源于传教团收藏的档案以及《中国福音报》(Китайский благовестник)上刊登的文章。与阿多拉茨基不同的是,他将传教团的历史开端视为1713年,即第一届传教团的组建年,而不是其派出的1715年。在传教团历史的分期问题上,《俄国东正教驻华传教团简史》编写者不同意阿多拉茨基分为1685年至1745年和1745年至1808年两段的观点,而是按照传教团的隶属关系分成三个时期,即1713年至1745年和1864年至1914年隶属于圣务院时期,1745年至1864年由外

① Адоратский Н. Отец Иакинф.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этюд//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собеседник. 1886, №2, 3, 5, 7.

② Хохлов А. Н. Николай Адоратский (1849—1896)—Историограф Пекин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③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 составленная по случаю исполнившегося в 1913 г. двухсотлетнего юбилея е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1-е изд. Пекин, 1916, С. 222.

务院(后改称外交部)领导时期。《俄国东正教驻华传教团简史》概述了驻北京传教团的历史,特别是对1900年以后的历史有比较真实而详尽的描述,其学术价值显而易见。遗憾的是,编写者只在书后列举了参考书目,在文中没有进行注释,给后人确定其资料来源带来不便。笔者在阅读《俄国东正教驻华传教团简史》有关前八届传教团内容时,发现与阿多拉茨基的著作多有重复,但编写者并未注明。

帝俄时期除了以上介绍的几部专论以外,其他僧俗学者在其著作中也曾程度不同地涉及驻北京传教团历史,如叶舍夫斯基(С. В. Ешевский)的《俄国的布道事业》(Миссионерство в России)(1867年)、科罗斯托维茨(И. Я. Коростовец)的《中国人及其文明》(Китайцы и их цивилизация)(1898年)、阿尔罕戈洛夫(С. А. Архангелов)的《我们的境外传教团:俄国东正教传教团概论》(Наши заграничные миссии: Очерк о русских духовных миссиях)(1899年)、季霍米洛夫(Л. А. Тихомиров)的《俄国的基督教传播使命与远东》(Христианские задачи России и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1900年)、罗马什科夫(Д. Ромашков)的《俄国境内外传教的关系及其各自成功的条件》(Связь внешней и внутренней миссии и условия успехов той и другой)(1903年)、瓦西里(Василий)修士司祭的《论俄国正教布道的实质》(О сущности православно-русского миссионерства)(1906年)和屈纳(Н. В. Кюнер)的《远东国家现代史》(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стран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10年)等。其中大部分作者把东正教与天主教在华传教业绩相比较,认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的传教业绩甚微,并将原因归咎为资金投入不足。

20世纪初,随着俄国东方学历史研究的开展,作为俄国汉学研究基地之一的驻北京传教团成为东方学史专家从汉学发展史角度关注的重要对象。开此风气之先的是俄国东方学界领袖、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教授巴尔托尔德(В. В. Бартольд)。1911年,巴尔托尔德在自编讲义的基础上,出版了《欧洲与俄国的东方研究史》(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Востока в Европе и в России)一书。此作不仅是俄国,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东方学历史专著之一,很快被翻译成了德、日等语言,并于1925年在俄国再版。作者在有关俄国汉学的章节中介绍了驻北京传教团的满汉语言学习和中国问题研究状况,认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在耶稣会士被驱逐之后为俄国的中国研究创造了极其优越的条件”^①,高度评价了比丘林、西维洛夫(Д. П. Сивиллов)、巴拉第(П. И. Кафаров)和瓦西里耶夫等由传教团培养的汉学家的成就。

可以说,在1917年以前,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历史研究取得了很大

^① Бартольд В. В. 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Востока в Европе и в России. Л., 1925, С. 199.

进展,表现出了鲜明的特点。首先,研究主体主要是驻北京传教团的神职人员。其次,几部著作侧重研究传教团宗教层面的活动,对于诸如传教团在中俄关系史上扮演的使馆、学馆和商馆角色等许多重大问题着墨不多。最后,这些作品都采取编年体例,述多论少。另外,世俗学者巴尔托尔德的著作为在东方学史框架内研究传教团的文化功能开辟了道路。

2. 苏联时期:作为汉学史研究的阶段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共和国对华外交被赋予了全新的内容,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中国革命成为新时代的主题,其任务是阐释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意义及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主义联系,同情并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与此同时,新政权剥夺了东正教会的财产和特权,取消了东正教作为国教的地位,教徒人数急剧下降,教堂大部分被关闭,宗教活动受到限制,东正教被视为腐蚀人民的精神鸦片,无神论占据了统治地位。学术界开始按照马列主义理论重新认识传教团性质。20至30年代苏联历史学界把传教士归结为资本代理人。巴拉诺夫斯基(М. Барановский)的《驻北京传教团:帝俄在华活动》(Пекинская духовная миссия: Из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царской России в Китае)(1930年)和笔名为Г. Л.的《驻北京传教团和19世纪30至50年代的俄中贸易》(Пекинская духовная миссия и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ая торговля в 30-50-е гг. XIX в.)(1932年)认为,传教团是俄国推行殖民政策过程中进行政治和经济间谍活动的机构。这两篇文章以传教团领班致外交部的报告为基础对所研究问题作出了新的解读。在以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中苏关系经历了友好与交恶的跌宕起伏,苏联历史学界对两国关系研究的重点也依形势的变化而调整。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地缘政治特点和对华外交需要,苏联一贯重视汉学研究。由于传教团所从事的文化交流活动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汉学研究范畴,所以,苏联汉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同时意味着对俄国驻北京传教团研究的发展。也就是说,苏联时期的驻北京传教团研究主要依托于俄国汉学史研究。

苏联时期汉学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包括彼·斯卡奇科夫(П. Е. Скачков)的《俄国汉学史纲》(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和《中国书目》(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Китая)、尼基福洛夫(В. Н. Никифоров)的《苏联历史学家论中国问题》(Советские историки о проблемах Китая)以及阿列克谢耶夫(В. М. Алексеев)的《东方之科学》(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 Статьи и документы)等。

彼·斯卡奇科夫是苏联著名汉学家。他自1914年开始关注俄国汉学史研究,1925年至1928年在中国工作,1930年返回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直至1964年去世。1932年他编辑出版了《中国书目》,对1730年至1930年二

百年间的俄文汉学文献进行了系统的著录,是当时最齐全的中国书目。此后他继续积累资料。1960年问世的《中国书目》增订本所搜集文献自1930年延长到1957年,信息量增加了约一倍,收录俄国和苏联研究中国的著作和文章19551条,并附有内容简介,是一部极为重要的文献目录,至今仍为俄国汉学史研究者所看重。《中国书目》全面收录了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成员已发表的著作。彼·斯卡奇科夫所从事的是一项基础性的、总结性的、泽及后代的工作。这个传统被他的同事和学生保持下来,在纪念其诞辰一百周年之际,齐赫文斯基、米亚斯尼科夫(В. С. Мясников)等人编辑出版的文集《时光延续》(И не распалась связь времен)就附有1958年至1991年苏联和当今俄罗斯的中俄关系、传教团历史和俄国汉学史研究著作和论文目录。至此,俄罗斯乃至世界各国的研究者拥有了一套十分完整的俄国汉学文献目录。

《俄国汉学史纲》是彼·斯卡奇科夫为学术界贡献的一部总结性著作,初稿完成于60年代中期,后由米亚斯尼科夫于1977年整理出版。作者将驻北京传教团视为俄国汉学的发源地^①,同时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了每届传教团的教士、学生、监护官、临时差遣人员、医生和画家学习中华语言、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情况,总结了从17世纪到十月革命前夕的俄国汉学发展历程,充分显示了驻北京传教团作为中俄文化交流主体的作用。

尼基福洛夫的《苏联历史学家论中国问题》重点介绍了中国历史在苏联的研究历程。作者在该书第一章“1917年之前俄国的中国历史研究”中,依次介绍了驻北京传教团培养的汉学家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成就,其中包括传教团培养的第一位汉学家罗索欣(И. К. Россохин)、将俄国汉学推向新高度的比丘林、出版《俄国驻北京传教团成员著作集》(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的巴拉第、俄国第一位深刻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扎哈罗夫(И. И. Захаров)以及圣彼得堡大学汉学掌门人瓦西里耶夫院士等。^②

阿列克谢耶夫的《东方之科学》也是从俄国汉学史研究的角度涉及了驻北京传教团问题。作者充分肯定了以传教团为主体的俄国早期汉学成就,称比丘林、巴拉第和瓦西里耶夫为帝俄汉学的三巨头^③,同时深刻剖析了十月革命以前俄国汉学人才培养的优劣得失,努力为苏联新汉学指明发展方向。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员霍赫洛夫(А. Н. Хохлов)是彼·斯卡奇科夫俄国汉学史研究事业的继承者。他数十年如一日,仔细爬梳收藏于各地

① Скачков П. 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 1977, С. 88.

② Никифоров В. Н. Советские историки о проблемах Китая. М., 1970, С. 5—18.

③ Алексеев В. М. 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 М., 1982, С. 57.